

汉字难学的实际考察以及对策构想^①

王开扬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美国中文学校的老师感到最头疼的问题是学生学习汉字畏难情绪严重。华裔新生代的母语为双语,他们由所在国口语进到书面语易,而由汉语再学习汉字难;华裔新生代因为有所在国语言及其书面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像国内孩子必须学会汉字——这是他们不愿意学汉字的最重要原因。汉字难学是华裔新生代中文学习和汉语国际传播的“瓶颈”。降低汉字教学难度,促进华裔新生代中文学习和汉语国际传播的最有效途径是“基础华文”。

关键词: 汉字;语言习得;双语;汉语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H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6-0107-04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for Hard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onceptional Countermeasures

WANG Kaiy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most troublesome problem for teachers in Chinese Schools of USA is that children ar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seriously when they ar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re bilingual, who can learn written language of situated country from spoken language easily, but difficult from Chinese to Chinese Characters. They use local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as their communication tool, so they needn't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as domestic children,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y don't like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Hard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pread for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the most efficient way for reducing difficul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promoting Chinese learning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pread is “Basic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Language Acquisition; Bilingual Language; Chinese International Spread

一 汉字难学的代表性论点

“汉字难学”是晚清以来学界早成定论的命题。1892年,卢懋章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1]的慨叹,随即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1934年,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

条高门槛:难!”^[2]1936年,王力说:“难学,就是汉字的致命伤。”^[3]1938年,王力:“而汉字之难学,仍是公认的事实。”^[4]1958年,已故总理周恩来说:“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5]1992年,吕叔湘先生说:“我曾经说过,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由于两个

^① 收稿日期: 2010-10-27
作者简介: 王开扬(1955-),男,江苏沐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人的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高尔基所要学着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宝所要努力降服的是汉字。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认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话。高玉宝学汉字的艰难过程是有记录的。”^[6]

据说斯大林向部属交付任务,部下畏难时,斯大林就质问:“难道比学汉字还难?”^[7]可见,对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充满信心的“钢铁之人”斯大林也是对“汉字难学”服了气的。

二 汉字难学的实际考察

应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邀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海外中文教育专家讲学团,我有幸作为成员,从2010年8月20日到9月6日,先后到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哥伦布、达拉斯五个城市对中文学校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参观和座谈。

本人担任汉字专题的培训任务。近年来一些文化名人接连对繁简汉字发表错误言论,引起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更增加了海外华人对于繁简汉字的困惑。针对这一情况,我讲了汉字简化的原理、历史、方法与效益、与汉字简化相关的几个关系,澄清这个领域里的种种疑惑。

讲学团的另一位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姚梅林教授,她讲的题目是《儿童学习心理规律及其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从六个方面阐述利用心理学原理提高汉字教学效率。

座谈讨论中,先后有多位老师补充说,从台湾来美的学生自小先从父母那里学习繁体字,后在台湾人办的中文学校里学习繁体字,等进了大学,在大学里学了中文课程,接触到了简化字,回到家里埋怨父母和中文学校的老师,说“有这么简便易学的汉字,为什么不早点教给我”。还有一位中文老师来自台湾,她听了讲座以后,很兴奋,认为把她以前朦朦胧胧感觉到的问题都说清楚了,简化字符合科学,符合汉字发展规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就是比繁体字好学好用,表示要把这次讲座的内容好好向台湾亲友、同事转达。

座谈讨论中,中文学校的老师们感到最头疼的问题是孩子们不愿意学汉字,有的学生一开始还认真学,可是随着识字量的增多,他们像“黑熊掰棒子,掰下来往胳膊窝里一夹,嘭——原来夹着的那个棒子掉了”;有的学生学了三百汉字,不够用,学到五百汉字、八百字,还是不够用,觉得遥遥无期,望而生畏,也失去信心,不愿意再往下学了;到了三、四年级以后,学生觉得中文课本身的内容太“小儿科”,没意思,也不愿学。

这样的事例在我以前的经历中也遇到过。2004

年11月,我到青岛去看望Z教授。Z教授是美籍华人,她的丈夫是美国的汉学家。辞别后她的儿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送我到公交站点,小伙子汉语口语说得很好,但是他说“认识的汉字不多,也就一千个左右,中国大街上所见到的汉字认不全,汉字文章基本不能读”。我的大学老师的孙子、外孙女分别在国内上到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随父母移民美国,虽然他们课余也上了中文学校,但是十几年下来,现在——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对汉字文本没有完全读、写的能力。

本人分析了海外华文教育面临的种种困难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改进、提高汉字教学效率的若干建议。

海外华文教育的最大困难还是在于汉字与所在国文字的性质不同所造成的难学、易学的差异。华侨新生代——以在英语国家的华侨新生代为例,他们的口语状况除了会英语一般还会汉语,双语生活——在家讲汉语,在幼儿园、学校讲英语。在学龄儿童阶段,由于英语也是他们的母语,由于英文是拼音文字(不同单体数量就是26个字母,直接表音间接表意,字母从左至右呈线形一维排列),他们在熟练使用英语的基础上学习26个字母的写法、读音和字母的拼写规则,用时很短就解决了向读、写系统的进军,以后就阅读英文以了解信息,增加知识,如果想写什么就把英语转换为字母。至于说到词汇,任何语言的词汇都分为生活词、知识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就生活词部分,这些词本来就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口头上、耳朵畔,不存在死记硬背的问题,这是和中国人学英语不同的地方;对知识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部分,他们也是原先不懂、需要学习和记忆的,但那是知识学习和语言学习的问题了,跟文字学习没有关系。在生活词领域,他们从听、说到读、写的学习过程,跟北京的孩子学习汉语拼音的过程在本质和原理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北京的孩子学了汉语拼音并不当文字使用,还要以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重新一个一个地学习汉字。不过英文是拼音文字中老化最厉害、表音率最低的文字,它的表音率低于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芬兰文等等文字,也低于汉语拼音的表音率。汉语拼音的表音率是100%,英文的表音率表音率有71.4%^[8]、85%^[9]、75%^[10]三种说法。尽管如此,英文单词的拼写记忆也比汉字的默写容易多了。华侨新生代学习学习汉字的必要性跟中国孩子是不同的。他们只会汉语口语、不会汉字,不妨碍他们通过书面语了解信息、增加知识,因为他们有另一条路

径——可以通过英文来进行。中国孩子到一定年龄阶段也学习英语,但那是第二语言习得,他们整个儿生活在汉语、汉字的环境里,不学会汉字,就没法儿进入到汉语书面语的领域,因此他们除了学会汉字别无选择。中国孩子的这种学习过程,使他们产生了两个心理偏差:一是由于他们在幼儿期的母语不是双语,学龄期不是在两种母语口语的基础上学习两种不同的文字体系,没有对比,因而意识不到汉字的难学——所谓“鱼儿生活在水里,……但鱼的视野被水限制住了”^[11];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心理偏差是他们还把第二语言习得的困难误以为是拼音文字学习的困难,常常听到中国人尤其是专家学者都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地责问“你说拼音文字容易学是不是?(答:是)英文是不是拼音文字?(答:是)那我学了二十多年的英文,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学会”,其实他不知道,他“二十多年没学会”的是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至于记录英语所用的“文字”——26个字母,他早在一星期内就学会了。这两个心理偏差严重地阻碍着汉字改革的研究。

中文学校三、四年级以后的学生觉得中文课本本身的内容太“小儿科”,没意思,是因为汉字生字的学习负担降低了课文本身的信息量和深广度,和他们在英文课里得到的相比,太短、太浅,跟他们通过英文达到的知识水平和思维水平不匹配,他们觉得被过低评价。

英美人语文学习的一般情况。他们在幼儿期学会母语——英语,到学龄期学习英文的情况和华侨新生代学习英文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学汉语汉字,就一辈子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繁难的文字体系;如果他们在某个年龄阶段学习汉语、汉字,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汉字这种不跟词音挂钩、需要一个一个死记的繁难的文字。

本人这次赴美讲学,也了解了美国小学的英文教学情况。本来,我预期买到一套类似于中国小学“语文”课本的12本“英文”教材,结果没有买到——我要买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到之处,中文学校的老师和我以前就认识的移居美国的朋友都说,美国小学没有统一的“语文”课本,只有州颁布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规定了学习音标和语法的学年、学期阶段,教师根据大纲自己选择阅读材料作为课文,即使是同一所小学的统一年级的“同轨”教师,也是各人使用自己所选择的阅读材料,互不一样;州教学大纲是考试的统一依据;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前班一年,1—12年级),包括“LANGUAGE(语言)”在内的所有科目都没有家庭作业。朋友给我复印了犹他州“LANGUAGE(语言)”课程

教学标准、北卡罗来纳州的“Grammar(语法)”教学标准。我的一个朋友定居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受我之托搜集材料,其中一位邻居——退休的“语文”教师听说中国老师需要,非常高兴,把她保存了一辈子的语文教学资料全部赠送给我,我朋友捎来时总重量33磅(15公斤),这位美国女教师的慷慨、热情、友好的情怀令人感动不已。这些资料基本是儿童读物,其中有书籍(最早出版于1903年,还有出版于1910—1939年的),有她自己编印的读物(机械打字机打字、蜡质油印)和作业,还有一份打印的汉英对照汉语课本《新概念汉语》。这些材料对于中英文“语文”教学对比研究极有参考价值,有的已经很有文物价值了,弥足珍贵。

这些材料反映出:美国小学生基本不存在学“字”问题,他们的文字差不多简单到没必要专门教学的地步,语言教学的任务就是音标、语法、阅读理解、口头表达训练和书面表达训练,他们根本没有汉字教学中“米字格、田字格,一个生字抄写几遍,下一次默写生字,不会写的字画个圈或者写个拼音在那儿”的问题。像讲学团的另一位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姚梅林教授讲的《儿童学习心理规律及其在华文教学中的应用》,从六个方面阐述利用心理学原理提高汉字教学效率,对于英美学龄儿童是根本不需要的——他们自动阅读以增加知识和智慧,自动写作以表达愿望和思想,本来就兴致盎然了。

我校(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的学生给我捎来了俄语小学一至四年级(相当于我国初小)的教材,这套教材反映出:由于俄文在1917年经过正词法改革,其表音率几乎百分之百(单词拼读和口语说话完全一致),所以他们没有英语“四十八个国际音标”的教学任务,其他的字母书法训练,阅读、写作训练也和英文教学差不多。

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体验汉语系列教材《体验汉语(韩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反映出:谚文教学就是40个谚文字母平面二位组合与韩语的词音相对应,汉字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笔一划地写。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写的教材分为《拼音》和《中文》两套,其中《中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12册,每一课下面都有“生字”、“描一描,写一些”(米字格,按笔顺分解),每一册后附录“生字表”,第12册后附录“总生字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字和表音文字尤其是拼音文字相比,孰难孰易,事实清楚,一目

了然。

三 降低汉字教学难度的对策构想

面对汉字教学难题,本人也向全美中文学校的老师推荐种种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譬如看图识字法、俗文字学阐释法、集中识字法、规律类推识字法、“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法;其中效率最高、最有前途的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法,就是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并在一定场合代替汉字的方法。这个方法本来是黑龙江省在1980年进行的汉字教学改革实验,得到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支持。2003年,周有光前辈发展了这一方法,提出“基础华文”,就是用一千多个汉字加上汉语拼音作为汉语书面语,编印、出版一套《华夏文化丛书》,专供华侨和学汉语的外国人阅读。原国家语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王均教授在周老的倡议书上领衔签名表示支持,一批著名学者都签名支持,笔者也签名支持。笔者认为,这是在现阶段部分克服“汉字难学”难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可以使华侨新生代和学汉语的外国人提前进入阅读和写作状态。

“基础华文”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工具,已经应用于人名、地名拼写,科技代号、盲文、聋哑人手语、旗语、灯语、网络语言等等“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华侨新生代和外国人学汉语的领域,作为他们在一定阶段的汉语书面语文。

中、外人士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其难度是对等的,而外国人学习汉字的难度远远大于中国人学习外国字母的难度;华侨新生代在双母语的基础上学习汉字的难度远远大于学习所在国字母文字的难度。撇开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因素不谈,也撇开第二语言习得的难度不谈,仅仅“汉字难学”就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不要说“汉语国际推广”,就是华侨新生代进入汉字书面语都很困难,更遑论“汉语国际化”。当然,“世上无难事,只要功夫深”,所有人类的发明都是能学会的,就是今日中国用小篆、甲骨文作为文字工具,中国学生,华侨新生代和外国的少数人也能学会;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进入

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教士们在基督精神鼓舞下不仅学会了繁体字,还学会了中国北方人都学不会的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但是,要求大多数人都具有这种精神是不现实的,花费如此之大的精力和之多的时间是不合算的,也难以适应现代高效和快节奏的社会。这里有“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的差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降低语文学习难度,以节省时间和精力用于其他更有价值的方面,是人人都能算得出来的明白账。简化汉字比繁体字的学习难度低,“基础华文”又比简化字的学习难度低,这是在现阶段华文教学唯一差强人意的路径和方法了。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则华侨新生代的中文学习和外国人学汉语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还不是展翅飞翔,但也不是在泥泞中艰难跋涉,而是甩开双臂大步奔跑了。

参考文献:

- [1] 卢戡章. 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2.
- [2] 鲁迅. 门外文谈[M]//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室. 鲁迅论文字改革.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2.
- [3] 王力. 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M]//王力文集:第20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219.
- [4] 王力. 汉字改革[M]//王力文集:第7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291-292.
- [5] 周恩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M]//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7.
- [6] 吕叔湘. 由笔误想到的[M]//未晚斋语文漫谈.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69.
- [7] 武惠恩,高凤英. 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J]. 瞭望新闻周刊,1995(52):47.
- [8] 范可育. 论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读音规律问题[J]. 文字改革,1984(3):19-22.
- [9] 安子介. 解开汉字之谜简缩本[M]. 香港: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90:165-166.
- [10] 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82.
- [11] 周有光. 在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座谈发言[C]//语文现代化第一辑.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25.

责任编辑:李珂